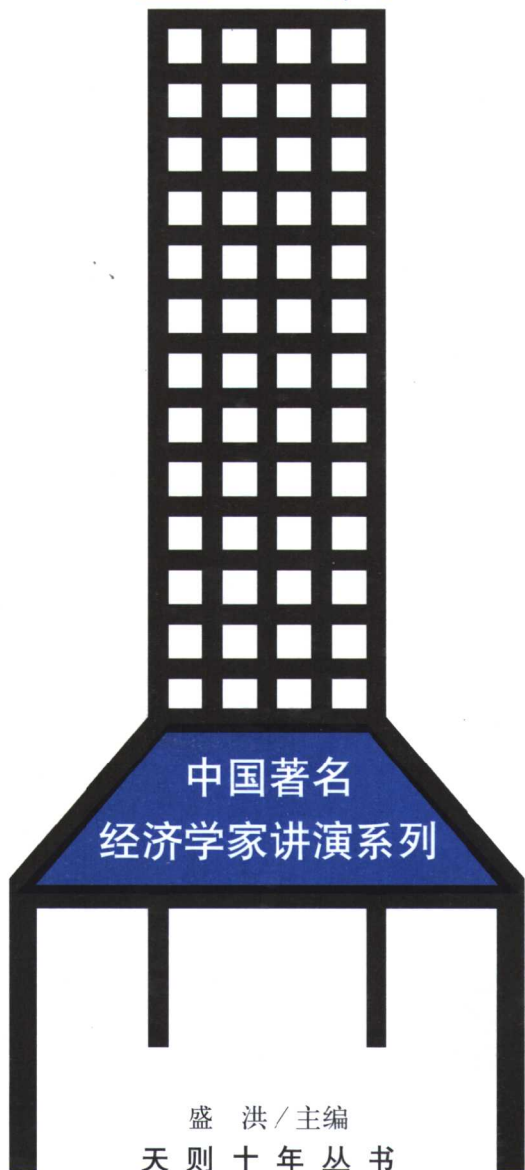


盛 洪




中国著名
经济学家讲演系列

盛 洪 / 主编
天 则 十 年 丛 书

为什么制度重要


Why Do Institutions Matter

 郑州大学出版社

盛 洪

为什么制度重要

Why Do Institutions Matter

 郑州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为什么制度重要/盛洪著. — 郑州: 郑州大学出版社,
2004. 1

(天则十年丛书·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讲演系列/盛洪
主编)

ISBN 7 - 81048 - 864 - 3

I. 为… II. 盛… III. 经济制度 - 中国 - 文集
IV. F121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27032 号

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)

出版人: 谷振清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制

开本: 635 mm × 960 mm

印张: 14. 875

字数: 210 千字

版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

邮政编码: 450052)

发行部电话: 0371 - 6966070

1/16

印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 - 81048 - 864 - 3/F · 37 定价: 26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

目录

· 1 ·

113 93 87 66 56 51 48 43 20 1

「为什么制度重要」

制度的起源



第一讲

为什么制度重要



第二讲

向制度投资



第三讲

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



第四讲

制度经济学面临的新问题



第五讲

国家兴衰的制度经济学



第六讲

对冲基金、民族国家和经济自由主义



第七讲

在历史中理解经济自由主义



第八讲

寻求中华民族新的制度结构



第九讲

水权制度与治水哲学



第十讲



目录

· 2 ·

220 189 151 116

如何赢得地区间竞争



第十一讲

探寻中国的企业制度



第十二讲

面对新的国际竞争政府职能的变革



第十三讲

公用事业向民资开放



第十四讲

第 1 讲

制度的起源^①

非常高兴到中央财经大学来。今天演讲的题目,是我和主办方商量以后确定的。我非常欣赏主办方的取向。原来我还猜测会不会提出些热点问题的讨论。这些东西我不是很擅长的。现在的大学生比较浮躁,应该说,在大学里应该学习一些理论方法,特别是一些基础性的理论方法,而不是急于得出一些现实的结论。所以主办方的这种取向可能更好一些。

今天的题目是讲制度经济学。制度经济学是在六七十年代以后逐渐兴起的,在八九十年代形成高潮。先后有几位重要的制度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。一个是布坎南(1987),另一个是科斯(1990),还有一个是诺斯(1993)。这就形成了一个高潮。

今天这个题目是探寻制度的起源。先大致给大家讲一讲制度经济学的门派和源流。

我们今天讲的是新制度经济学,过去也有所谓老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。老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是康芒斯和凡勃伦。康芒斯的代表作品是《制度经济学》,凡勃伦的代表作品是《有闲阶级论》。后制度经济学以熊彼特和加尔布雷斯为代表。

^① 在中央财经大学的讲演



新制度经济学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。狭义的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科斯传统。广义的还有两个重要的流派,一个是布坎南,另一个是奥尔森。布坎南的理论是公共选择理论,他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公共选择问题。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方面。奥尔森的代表性著作是《集体行动的逻辑》。

奥尔森大概是1998年去世的。他60岁出头就去世了。经济学家一般都活得比较长,哈耶克是90多岁去世的,科斯现在92岁了,还健在。奥尔森算是英年早逝了。如果他不逝世,有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,很可惜。

为什么要研究制度的起源呢?从制度经济学来讲,主要研究几个方面,一个方面是制度的起源,第二个方面是制度的变迁,第三方面就是制度的结构。

制度的起源是非常根本的方面,这是一个含义。另一个含义,我们学习,我们做学问,要有一个非常端正的态度叫做要追根寻源。我们今天讲制度的起源,就是要追根寻源。第三点,其实探寻起源是一件非常令人着迷、引人入胜的事情,充满了趣味。比如达尔文的《物种的起源》。很多人做学问就是从探寻起源开始做起。制度经济学的很多东西有很强的追根寻源的色彩。比如科斯的两篇重要文章,一篇是《企业的性质》,另一篇就是《社会成本问题》,就是这两篇文章使科斯获得了诺贝尔奖。我经常说,科斯的诺贝尔奖的每个字的含金量是最高的。《企业的性质》就是一篇探寻企业起源问题的文章。这篇文章是非常成功的,当然也是一篇非常经典的论文。

制度经济学家经常在思考制度的起源。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制度。有些制度非常好,非常有效率,好到我们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。往前探寻,这些制度之所以产生,在今天有这样的效率,但一开始充满着惊险。比如我们买东西,今天看来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,一开始却是充满着曲折的。据说我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原来交换物品时,就是将物品放在空场上,然后在树林里看着对方拿走,并放上交换的物品。但有可能,别人拿走东西并不



留下东西。

探寻起源是一件有趣的引人入胜又有实际功效、让人们对制度有一个理解的事情。比如制度经济学讲产权起源的问题。这样一种探寻，充满着有趣的设想，因为制度起源是很早发生的，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如何起源的呢？制度经济学在这方面有两个方法：思维实验和讲故事，实际上是一个方法，思维实验也是讲故事。讲一个故事，就是设定一个情景来推断制度的起源。

有一棵苹果树，这棵苹果树没有主人，野生的，旁边有两个人，这两个人都是我们假定的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人。最后结果是什么样的呢？制度经济学回答说，这两个人吃的都是青苹果。因为这两个人都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，他就得多摘苹果。要多摘苹果，就得早摘苹果。晚摘的话，别人就摘走了，这两个人就进行早摘苹果的竞争，竞争的结果就是苹果还没有熟就被摘了。这个时候双方就只能吃青苹果。

最后双方会想，与其这样做，不如达成一个协议。比如说，双方各拥有 50% 的权利。双方把合约规定好了。双方都不用担心苹果还没熟就被对方摘了。他们得到了对方的一个承诺，苹果熟了，我分给你一半。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关于产权起源的故事。结果是大家都吃上了熟苹果。

社会中有很多的制度，今天重点讲国家的起源。制度经济学就猜测这样的制度是如何产生出来的。关于国家起源有很多的理论假设。有很多历史学家、政治学家都在用自己的方法探索。

对于国家制度，制度经济学也充满了好奇。现在的国家制度是如何形成的？现在的国家起源有很多假说，主要有两种，一种是契约论，还有一种是暴力论。关于契约论。比如一个社会，人们白天很努力地放羊，晚上羊被人偷走了，他们就会不好好地放羊，结果整个社会都会变穷。人们逐渐认识到，应该有一个政府组织来管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，限制对别人的产权的侵犯。于是大家投票同意建立一个政府。这样的假设，仔细想想是不成立的。一个国家如果要靠投票来形成的话，投票人的权利就必须事先是平



等的。但在没有国家的时候,人和人是没有办法平等的。有些人有体力上的优势,他们会恃强凌弱。要有一个人与人在权利上平等的社会就必须先有国家。这是个悖论,因而契约论实际上是不成立的。

另外一个人,奥尔森对此也持怀疑态度。关于布坎南和科斯的理论,大家知道得比较多,但奥尔森的理论国内介绍得比较少,我重点讲一讲奥尔森的理论。他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叫《集体行动的逻辑》。他发现一个问题。很多人都有共同的需求,这就是集体产品。我们都是消费者,我们都不愿自己的利益受侵犯。保护所有消费者的利益就是消费者的集体产品。这些共同的集体的产品,如果能实现的话,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公共卫生就是一个大家的集体产品。大家都喜欢乱扔东西,就有个别人想把环境打扫得干净一些,但实行起来很困难。

假如一个小区有1 000人。我做了一件好事,比如打扫了小区的卫生,但获得的利益只有千分之一。我做一件好事,而大多数人搭便车,这件事情是不能做的。结果是小区的公共卫生非常糟。假如每个人出一点钱,就能把问题解决了。但大家联合起来达成一个协议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。这件事情是要花成本的。愿不愿出钱,愿意出多少钱,甚至自己不想出钱,却想让别人出钱,意见会很不一致。结果公共卫生问题解决不了。往前推,假如人少,事情就好办些了,人越多事越不好办。这是奥尔森写《集体行动的逻辑》的基本结论。他的《集体行动的逻辑》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。他后来一直用这个理论来分析问题。

假如只有三个人,就好办了;假如有一万人,就不好办。人越多越不好办事。国家的形成就更难。因为要形成国家,少则需要几万人的意见一致,多则上亿人。这么多人就成立国家达成一致就更不可能了。所以契约论的国家起源论是不可能的。奥尔森就转向了别的思考,经济学家也要借助于思维实验。奥尔森写了一篇文章《独裁、民主与制度的起源》。他受到一个中国故事的启发。他看到中国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时冯玉祥的故事。冯玉祥虽然是个



军阀,却颇有德政。他思考这样一个问题:为什么军阀还做一些好事?他假设一种情境,一个无政府的社会,实行的规则就是丛林规则,谁有枪就是草头王,结果是土匪横行。是土匪就得到处抢,土匪的利益是抢得越多越好。流窜的土匪有朝一日找了一个根据地,常驻下来,就成了常驻的匪帮。常驻下来以后,他的行为就会发生一些变化。给他带来最大利益的行为是什么?如果把老百姓的东西全部抢走了,老百姓就不愿再生产了。因为我生产的东西全被抢走了,我就没有积极性去生产了。匪帮把老百姓的东西全抢完了,就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了,就得有一个“合理的”抢夺率。这样的抢夺率,使老百姓还有积极性进行生产。这个抢夺率叫做“最佳抢夺率”。有的同学知道有一条曲线叫“拉弗曲线”,这条曲线与“拉弗曲线”是一样的。在抢夺率为零的时候,土匪一无所获;抢夺率太高,也一无所获。有一个最佳点。在这一点上,土匪的利益达到最大。为了自己的利益,土匪会自动将抢夺率调低到这一点。这样,一个常驻匪帮就成了一个有理性的政府。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。所谓的税率就是抢夺率。

奥尔森得出一个结论,最早的政府是通过暴力形成的。它为什么还有一些德政?它不是为老百姓着想,而是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,它会理性地把抢夺率调整到最佳点。最早的政府是通过暴力形成的,它把抢夺率叫作税率。它不仅自己不能抢,一个居民去抢另一个居民也是不行的。老百姓之间相互抢,居民的财产得不到保护,居民也没有生产积极性,于是政府提供了保护产权的服务。这个匪帮进而发现,居民之间进行交易,可能会产生冲突,如果没有公正裁决,会形成更大的冲突,形成冤冤相报,这时政府提供公正的司法裁决,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,也有利于它的收入的增加。

这个匪帮进一步发现,一个比较好的市场秩序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,就会提供保护和维护契约的执行这样一种公共物品。这样,一个惟利是图的匪帮,常驻下来以后,就变成了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。奥尔森发现了这个道理以后非常得意。这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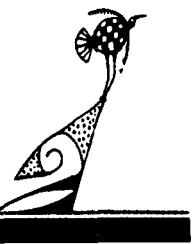
文章后来扩展为一本书,叫作《权力与前景》。他解释了从远古时期国家形成,一直到西方民主革命之前的政治制度。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棒的东西。我读了也非常兴奋。

原来的强盗变成了君主。但君主和君主也不同。君主活得时间短与活得时间长的行为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活得时间比较短的话,他就会尽力抢夺。如果明年就死,他就尽可能攫取社会的财富,供他一年之用。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路易十五的“我死后那怕它洪水滔天”。人的理性选择是在生前攫取最大的财富,这时他有可能破坏与居民之间的合约,破坏他自己原来定下来的最佳抢夺率,破坏他原来建立的秩序。

假如活得时间比较长,就会有比较长的考虑。这个解释不是十分严格的,但也能解释一些问题,比如对开明君主的解释。比如中国的康乾盛世,康熙和乾隆他们活得时间比较长,他们可以从容享受对老百姓的掠夺,不用竭泽而渔。奥尔森注意到了这个问题,他说过去臣民对国王有一句话叫作“国王万岁”,不是臣民阿谀奉承之辞,而是发自内心的理性选择。因为国王活得时间越长,就越有长远眼光,他的行为就越像征收最佳税率、提供更完善公共服务的这么一个人。臣民会从中获取好处。这些解释非常有意思,多少也有一定的道理。这是奥尔森的一套理论。

我看了以后非常折服,也提出了一些批评。最重要的批评是奥尔森依据的是西方世界的背景。西方世界的最大特点,就是西方世界的君主制的世袭制是不成熟的。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经常超不过两代。每一个君主都不知道继承自己王位的是不是自己的子孙。罗马帝国的皇帝经常被杀掉,然后又换一个皇帝,而且是不同姓的。奥尔森也说,君主制度所奉行的保护产权的制度一般不会超过一代人。我想这和西方世界的这样一种背景相关。

而中国有所不同。与西方不同的地方,中国的君主制度是比较成熟的、稳定的世袭制的君主制。这就提供了与西方君主不同的时间视野。因为一个人有个体生命有限的问题,但子孙可以被看作是个体生命的延续。冯友兰曾说,人的子孙就是人的生命在



生理上的延续。中国人更看重血脉相传、子孙延续。这样时间视野就得到了扩展,就不是仅考虑一代君王的问题,也会考虑自己的子孙万代。像秦始皇,他是一世皇帝,他考虑的是万世皇帝。与西方不稳定的君主制相比,世袭制度相对来讲是好的。写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的吉本就说过,我们一般认为世袭制是很愚蠢的,比如我们在电影中经常看到,一个小孩就做了皇帝。小孩怎么会做皇帝呢?但比起继承皇位引起的政治、社会动荡和互相杀戮,要好得多。

奥尔森关于国家起源的解释,在中国并不见得很适用。中国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经过研究,认为至少在禹的时代中国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国家。这与奥尔森所说的最初国家是很不相同的。我们想一想大禹治水走遍了黄河流域,幅员是很辽阔的。但大禹的时代,是新石器时代的后期、青铜器的早期,那个时候铜很宝贵。人们的武器是石器和很少有的青铜武器。我们可以想像,有哪一个流窜的匪帮在这样的武器水平下,却能统治这样大的一个国家?好像这是不能成立的。奥尔森的思维实验非常漂亮,但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

幸好,我发现,有很多人在研究中国的上古史。有一个叫张岩的学者写了一本《〈山海经〉和古代社会》的书,他提出了中国国家起源的一种假说。他提出,最初人类社会的秩序不是借助于暴力,而是借助于宗教形成的。

从人类早期,一直到今天,人类一直有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,比如人的生命有限的问题,它导致人对死之和对超越自然的力量恐惧。这就形成了原始宗教。原始宗教一开始来源于恐惧。这些恐惧经过了一系列的演变,形成了最初部落中的图腾崇拜。图腾可能与自己打猎的物种有关,他们认为这些动物是上帝恩赐给自己的,因此把图腾崇敬为神。图腾在部落中有极大的影响力,使大家崇敬。于是就出现了负责原始崇拜的专门人士——祭司。他们其实是人,他们不过扮演了一个传达神的旨意的角色。比如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,就经常扮演这样一种角色。他就可能有多



种选择,其中一种我称作“假传神旨”。我代表神来说话,你就要听我的。当时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领袖,但他也不得不敬畏杨秀清假扮的神。也有这种可能,他把他认为对这个社会有用的政治秩序当作神的旨意让人遵从。有些人可能不是这样,有些人可能是这样,不同的部落可能就有不同的祭司。但这没有关系,很多的部落相互竞争。都是假传神旨,在祭司以权谋私的部落,祭司可能多侵占了一些大家的供奉,这个部落因此就会衰落。而那些把比较正确的政治秩序导入的部落就会从此兴盛起来。这就形成一个循环,兴旺的部落就会相信假如我信神,神就会使我们繁荣。这些人就把自己与图腾联系在一起,把图腾看作是整个部落的象征,是一个活的有生命力的东西。这时就出现了借助于神权获得政权的一种形式。这个时候不需要任何暴力。常驻匪帮是靠枪让你服从他,给他纳税;祭司靠骗来让你服从,给他供奉。当然这些供奉里面,一方面是对神的供奉,一方面是给祭司们享用的,这最终就演变成了税,当然当时不是以税的名义。

张岩的这本书讲得非常有意思,《山海经》看来是一本非常荒诞的书,里面有许多半人半兽、鸟头兽身的东西。张岩说这些怪兽是部落图腾的整合。图腾是什么,就是部落的旗帜、标志。比如今今天微软的标志就是一个飘动的小窗户,多少万年以后就可能被看作是哪个部落的图腾。过去就是以动物或植物为标志,如这个是野牛部落,那个是虎部落。部落很多,它们之间有很多冲突,也就出现了相互之间的最初的整合。整合有很多方式,有的通过谈判,有的通过战争。无论通过什么方式,在远古社会,对神的敬畏非常强烈,战争不足以吓唬人,死这件事对有宗教感的人来说,不是最恐惧的事,所以最后还是要谈判,整合的结果就是达成两个部落间的协议。整合既包括政治权利的划分、经济利益的分配,也包括图腾的整合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包含了政治智慧的事件。因为图腾包含了全部的信息,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。最后两个部落都有认同感的图腾,必然是一个图腾的合并。比如虎部落和牛部落的图腾整合成了一个虎头牛身的怪物。张岩说《山海经》中的怪异动物



恰恰是图腾整合的结果。这个整合经过漫长的岁月。整合的部落越来越多,最后中原地带,即中华民族的发源地,整合在一起的东西、最后大家达成共识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四不像。我们知道,最后形成的图腾就是龙。龙是政治妥协、政治智慧的结果,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整合的结果。每一个部落都可以在龙身上看到自己的形象,比如蛇部落看见龙的身子是蛇。这也是中华民族图腾形成的一种假说。通过这样的整合,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政治体。

当时还有许多具体操作。通过这种整合,形成了一个中心的政权。这个政权把各个部落的图腾都放在首都。因为各个部落都把图腾看作是自己的生命,这些图腾就变成了天子的人质,各个部落就要心向着这个地方,他们就要祭祀这个图腾,就要到首都来。这就形成了最初庞大的国家。

还有一个重要事件,就是税收的形成。税收概念是判断不存在国家的重要的经济上的标志。税收是国家经济收入的形式。最初的税收是怎么来的?刚才讲的税收的形成,是用暴力掠夺的。如果你不交税,匪帮就拿枪逼你交出来。但在中国,税的形成不是这样。对神的崇拜是需要供奉的,要拿出一些食品和其他物品供奉给神。这些东西最初是供奉神的,实际上至少有一部分是给了部落的宗教领袖,这些宗教领袖同时又是政治领袖,所以这就是税收的萌芽。后来形成了国家以后,形成了一种制度,各个诸侯国要向天子,按当时的说法叫作“出入积”,“积”就是对神的供奉,因为部落的图腾在天子的帝都那里,所以名义上是供奉自己的神,但同时也向中央政权提供了财政资源。这种“出入积”自然成为中国最初国家财政运转的一个保障。这种制度后来又演变为进贡制度。到了大禹以后就形成了这种制度,有了“贡”的概念。

“贡”后来就变成了税。这有一个演变过程。这个过程是不知不觉的,税不是抢过来的,是以神的名义让你拿出来的。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国家形成过程,是和奥尔森所说的暴力论的国家起源过程截然不同的。这种假说,对中国的国家形成更有解释力,它给出了很多关于中华民族特性的启示。正像弗洛伊德所说,一个人





的一生的心理特征是在童年时期形成的,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也是在童年时期形成的。我们对中华民族的特征的把握也要从童年时期的经历和记忆入手。这种记忆说明中华民族的善于妥协、具有政治智慧、寻求文化整合的特性取向。这个假说一方面解释了中华民族的国家的起源,也给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特性。

不管是暴力论也好,还是宗教起源论也好,我们还可以再向前讨论问题。不管契约论是否在国家起源问题上成立,但今天的事实是,确实存在着很多的民主政体。民主政体是怎样形成的?奥尔森说,民主制度不是通过打倒暴君实现的,这时有可能产生另一种专制。奥尔森指出,民主政体存在的原因恰恰是君主政体不能存在的原因。民主政体的产生,是因为存在着多种势力,它们之间势均力敌,谁都打不倒谁,又不能分开来,分别去建立小诸侯国,还必须混居在一起。奥尔森说这种情况千年不遇。这个最先是在英国发生的,国王打不过议会,议会也不能完全战胜国王。在互相抗衡、谁也征服不了谁的情况下,就形成了社会妥协,形成了这样一个民主的社会合约。这不是人们事先设计的。

在《独裁、民主与发展》中,他作过这样的比较。现在大家都说民主政体是一件好的事情,大家都从道德上去评价。在民主制度下,大家可以充分表达意见,民主就受到大家的拥护。这种政治体制在道德上受到大家的拥护,但在经济上这种制度是不是优于君主制度,还是令人怀疑的事情。奥尔森的讨论继续了他对君主制的批评,即君王没有较长的时间视野,他没有长远的打算,虽然他有趋向要征收最佳税率,提供公共物品,但他的时间视野的局限妨碍他更好地提供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物品。

而民主政体有几个好处,一个好处是它解决了和平交接政府的难题,而这个难题在西方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。民主使政府有一个稳定的交接。另外,民主制度理念的起源是尊重个人的权利、尊重社会合约、尊重市场秩序。这种主张正好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对产权的保护,对秩序的维护,对纠纷的公正裁决是一致的。它提供了相对于君主政体更长的稳定秩序,这意味着给居民更长

的预期。正像孟子说的,有恒产者有恒心。而现代社会的发展,如很多经济学家所说的,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投资。更长的预期意味着更长期的投资。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长期投资。有长期投资,就有更高的效率。

奥尔森在他的文章结尾是这样说的,尽管大家对民主政体有很多的称赞,但它的经济上的功效几乎是没有被大家所注意到的。他的最重要的结论是,民主政体在经济上也是非常有效的。

今天就讲这些。下面请大家提问。

答问

问:盛博士,您好!您能否谈一下产权与交易的关系吗?

答:我曾经有过一篇文章,就叫“交易先于产权”,这篇文章遭了一些批评。交易和产权是互动的。在教科书中,先有产权,再有交易。我们界定了产权与交易的关系。但产权是一个社会概念,如果只有一个人,就无所谓产权。鲁滨逊所在的孤岛上,无所谓产权。有产权概念的存在,最少要有两个人,他们之间要划清产权边界。刚才我讲的苹果树的故事,要界定产权,两个人是要谈判的,谈判就是交易。这里的产权是广义的产权,我们现在所讲的产权是狭义的,是指政府法律保护的产权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,狭义的产权不同于广义的产权。广义来讲,政府也是交易的结果。如果说,有产权才能交易,那永远不会有交易。很多产权是因为有交易的需求才产生的。所以还是交易先于产权。

问:盛先生,听说您信奉存在主义哲学,您能否谈一下对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看法?

答:我好像没有说过我信奉存在主义哲学。我是一个经济学家,经济学家确实要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。这个世界不能完全用理性主义解释,也不能完全用功利主义对待。理性主义有边界,比





如说人的生死问题不能用理性主义去解决。理性是有边界的。我们有一个概念,即有限理性。理性有边界,就不能用理性主义解释所有现象。功利主义也是如此。如果用功利主义的态度对待所有的事情,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没解。任何一个经济学家,包括任何一个学经济学的学生,都可以坚持从功利主义、理性主义出发,沿着这条路线走,你会得出一些结论,有些问题没解。你的态度必然会转向其他思想资源,包括一些人文的资源,包括一些宗教的资源。前几年我曾经评价过汪丁丁,他当时在经济所谈论道德。我说,如果一个经济学家讲道德,那说明他是一个成熟的经济学家,因为他发现了经济学的边界。

问:东方先贤提出的“家国同源说”、“定分止争”,提供了一个思考国家起源问题的不同于西方学术传统的视角。

答:非常惭愧,我没有认真读过这些学说,这些学说是合乎逻辑的。这些不同的思维资源会使我们得出不同的结论。“家国同源说”是说家族与国家在起源上是同源的。传统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,是以家族制为基础的。“五四”以后,家族制基本被摧毁。但中国家族制度的传统是根深蒂固的。前些日子,我看过一本书,叫作《银翅》。其中谈到在福建一带的习俗、文化,说即使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,家族制度在那一带也是存在的。我们今天在南方经常能看到家族祠堂,祠堂里摆了很多的祖先牌位,大概能有十几代。这种东西在福建农村一直存在,最“左”的时候,在家里用一个纸条写上牌位摆出来就可以了。这是家族制度的一个方面,叫祖宗崇拜。另外是家族体制,南方的同学可能更清楚。家族有具体的组织,有具体的族规,还有一些活动。这与刚才讲的中国的国家起源并不矛盾。刚才讲,中国的国家起源是由家族而部落,由部落而聚合成国家。基础仍然是家族。

问: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创新是来自统治者的,而非选民。不说中国的经验,法国大革命也不是这样的。

答:我觉得这话是有问题的。好像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强调制